

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

第二辑




#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 西方后真相问题研究

海外传播

宋芹 / 著

技术哲学·后真相  
反思媒介化社会进程  
“祛后真相化”刍议

A STUDY ON WESTERN  
POST-TRUTH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 西方后真相问题研究

A STUDY ON WESTERN  
POST-TRUTH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宋芹 / 著

中国传媒大学  
青年学者文丛

第二辑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西方后真相问题研究/宋芹著.--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2.4

ISBN 978-7-5657-3161-7

I. ①社… II. ①宋… III. ①互联网络—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11255 号

##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西方后真相问题研究

SHEJIAO MEITI YUJINGXIA DE XIFANG HOUZHENXIANG WENTI YANJIU

---

著 者 宋 芹

策划编辑 蒋 倩

责任编辑 姜颖旻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李志鹏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65450528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57-3161-7/G·3161

定 价 56.00 元

---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总序

时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 60 周年之际,中国传媒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资助项目正式选定了十部支持专著,这是我校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成绩。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落实学校科研支持政策,更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2014 年,李克强总理与历年国家杰出青年科研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交流时曾提到,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是国家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代表着国家创新的未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学术发展也是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校 60 年来,我校在科学研究方面产出了大量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信息传播领域,我校广大教师正确面对我国信息传播事业飞速发展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迎难而上、克难攻坚,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科研热情,坚守着学校的殷切期望,及时、准确地把握国家提供的战略契机,以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信心面对挑战、迎接挑战,积极开展多领域、内容丰富的科研工作,收获了累累硕果。在 2012 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我校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两个学科均排名第一。

目前我校的3个学部(新闻传播学部、艺术学部、文法学部)、1个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和5个直属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广告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MBA学院)是文科科研和艺术创作的主要力量源泉。同时,学校文科方面还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传播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3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动画学2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等部级研究机构13个和校级科研机构40个,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近年来,我校在人文社科领域先后有2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入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5人入选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次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人次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更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荣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含金量较高的奖项。众多奖项和数字的背后,凝聚的正是全校思想活跃、朝气蓬勃的广大青年教师夜以继日、笔耕不辍的成果,他们是真正帮助我校文科科研日益发展壮大的薪火相传的主力军。这支主力军的成长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校立足长远,着力于对广大青年教师进行有计划、有目标的专业培训,加大对青年教师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鼓励青年教师进行交叉学科项目的科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的设立,有效调动了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整体提升了我校人文社科的科研氛围与科研能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讲座,积极拓展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研究《艺术创作与获奖评价体系》,将科研与艺术创作有效结合,激发广大教师艺术创作的热情;研究《重点学科指标评测体系》,将我校的优质学科与国内外顶尖高校的相应学科进行深层对比,巩固我校两个优势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打造《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手册》,方便教师全面了解科研工作情况;建设完成文科科研成果库(一期工程),共收集信息传播领域

论文 15 500 余篇、著作 3 258 册、研究报告 730 余篇,形成了我校自建校以来最为完整的科研成果文献体系;本着“高标准、精投入”的原则,集中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引导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围绕全媒体、大数据等热点领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营造了一个砥砺切磋的良好学术环境,促成了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另一方面,我校广大青年教师努力开拓创新,将现代理论有机融合于具体实践之中,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变化,不断寻找立意新颖的科研课题,以蓬勃向上和不断进取的青春锐气、以孜孜不倦和奋力前行的勇气,扎根于文科科研工作,并不断茁壮成长。青年教师在学校“钻研、精研、深研”的方针指导下,凭借着旺盛的科研热情,在一系列科研、教学比赛和国际学术拓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此次青年学者出版资助项目就是这些科研成果中的一部分。也正是在优渥的科研鼓励政策的鼎力支撑下,才有了一批 30~45 岁的优秀青年学者倾心无忧,精心钻研,用心谋划,专心致学,大胆施展才华,安心科研工作,最终促成了“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的顺利面世。

学校文科科研的发展离不开青年教师的成长,学校管理机制的完善助力于青年教师的进步。希望我校广大青年教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前行!

是为序。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

廖祥忠

2015 年 12 月 8 日

##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什么是后真相:后真相的概念、起源与衍变 .....	17
第一节 后真相的概念:主观选择与客观事实的博弈 / 17	
第二节 后真相的起源:自由与多维的社会实践空间 / 23	
第三节 后真相的衍变: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分裂 / 29	
第二章 社交媒体语境下西方后真相的多重表现 .....	35
第一节 网络信息秩序混乱 / 35	
第二节 另类事实与空间 / 41	
第三节 媒体公信力受损 / 44	
第四节 计算式宣传扰动 / 49	
第三章 媒介化社会:西方后真相问题背后的新媒介环境 .....	55
第一节 社交媒体的数字化媒介环境 / 56	
第二节 社会化媒介场域的建构 / 65	

第四章 媒介自由、商业化与政治:西方后真相的制度分析 .....	93
第一节 西方媒介自由与商业化发展 / 93	
第二节 从政治与媒体的关系看西方语境下的后真相问题 / 104	
第五章 研究思考与启示:后真相困境下的社交媒介规制 .....	121
第一节 祛后真相化:构建社交媒介规制体系 / 121	
第二节 宏观层面:从政策导向的角度构建社交媒介规制体系 / 127	
第三节 中观层面:从媒介机构的角度构建社交媒介规制体系 / 134	
第四节 微观层面:从内容制作的角度构建社交媒介规制体系 / 137	
第五节 在地化路线的可能性分析 / 143	
参考文献 .....	148
后 记 .....	175
编者的话 .....	179

# 绪论

西方民选实践不断失败,舆论反转新闻层出不穷,泛娱乐化与虚假信息横行当道,事实与科学发现受到党派宣传的攻击,公共辩论沦为偏执己见之争,网络信息秩序混乱……特别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和英国公投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以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后真相问题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传媒与公众关注的焦点,“Post-Truth”(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为当年年度第一热词。

后真相是指这样一种情境:诉诸情感与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其中,后真相概念包含了影响舆论场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客观事实和真相,一是主观情感与价值,而两者的失衡与失序,价值先于事实、情感高于真相,是导致后真相问题的最直接原因。后真相现象的产生具有极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包括经济利益分配不均、新自由主义、市场失灵、开放而失序的新媒介环境、社会共识的失范、非理性因素沉渣泛起及公众确认性心理偏差,等等。因而,后真相研究对理解当下社会问题与现实处境具有症候学上的意义。

当下,伴随媒介、社会与技术的共生演进,信息生产与分发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个性化、社会化及多元化趋势。社交媒体为普通用户提供了一种从社会信息系统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通过改变信息消费方式增加了社会与民主参与的频次、广度与深度,从而改变了个体认知框架,并在此基础上

影响社会整体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内容数据变得更容易选择,从而导致信息使用者更容易得到想要的结论。诚然,以参与性、开放性、对话性、社区性和连接性著称的社交媒体在推动人类文明传播与社会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也给当下的信息环境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多义模糊、信息冗余、情感泛滥和过度娱乐化等问题,这无疑对“褒主观、贬客观”的后真相现象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社会化媒介环境是催生当下一系列后真相问题的养料与土壤。毕竟,后真相问题不仅是指某个具体的事件及其后果,它更指向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实践语境。

聚焦新闻传播学领域来剖析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西方后真相问题,对反思当下媒体良性发展及其与公众、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故而本书拟从概念辨析、症候剖析、媒介分析、制度分析和祛后真相化这五个相互连接的部分出发,合而归一,对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西方后真相问题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围绕社交媒体与后真相现象的互动关系这一核心议题,重新解读在复杂的社会实践环境中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并探讨后真相背景下媒介的属性、地位及发展变革,以及公众和社会需求的相应变化。

在后真相现象被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等政治性黑天鹅事件点燃后,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甚至科学界等多领域研究学者开始聚焦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后真相现象,对后真相的定义、原因、动力机制及其治理路径等问题进行反思与定位,并迅速完成了初期的知识积累。

关于后真相的定义。“Post-Truth”一词最早由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1992年的美国《国家》(*Nation*)杂志上使用,他指出了政府企图遏制真相、掩盖事实的行径使美国民众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sup>①</sup>直至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中,将后真相一词的使用范围从政治拓展

① TESICH S. A government of lies [J]. *The nation*, 1992(254):1.

到社会生活领域,正式为后真相冠以“时代”之名,并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进行了批判和讨论。<sup>①</sup> 同年,美国记者埃里克·沃特曼(Eric Waterman)在《总统们说谎时》一书中使用了两个衍生词汇:“后真相政治环境”和“后真相总统制”,并借此批判了由实用主义原则替代诚信原则的美国政治的现实状态。<sup>②</sup> 2015年,美国媒体人、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sup>③</sup>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政权”一词。他从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和真相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政权”转向“后真相政权”,其特征是“真相市场”的激增,即权力通过控制媒介和社会,利用新的言论自由规则来参与、传播和表达。以上这些讨论大多从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角度出发,采用批判的态度肯定了后真相政治是一种非正义存在的说法,后真相问题的出现是对真相、真理的绝对威胁。

近两三年来,西方学界对后真相的定义进行了更加丰富的阐释。澳大利亚媒体与民主研究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认为,作为总括性术语的后真相应当包括四个维度:谎言(lies)、胡扯(bullshit)、插科打诨(buffoonery)和沉默(silence),它们从不同角度构成了对后真相的形象化描述。《经济学人》对后真相现象的解读是“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而是变得次要了”<sup>④</sup>。也有学者指出后真相是一种“另类认识论”(alternative

---

① KEYES R. 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4.

② ALTERMAN E. When presidents lie: a history of official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Inc, 2004:67.

③ HARSIN J. Regimes of post-truth, post-politics, and attention economies[J].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5, 8(2).

④ NOGUEIRA J. Post-truth politics: art of the lie[N/OL]. The Economist, 2016-09-10[2018-01-03].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6/09/10/art-of-the-lie>.

epistemology),它从根本上威胁了舆论环境与公众理性。<sup>①</sup>

例如,有的研究通过行为实验方法证实了错误信息的呈现可以抵消事实信息的有效影响,而人们在选择事实和客观证据时更容易被既有的信念和偏见引导;<sup>②</sup>有的学者认为后真相与“政治阴谋论”关系密切,将后真相现象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现:“后真相的危险不仅在于真理和事实被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挑战和颠覆过程中它被当作一种控制机制被加以政治支配。”<sup>③</sup>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透过政治、心理与历史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回答了“情感如何席卷世界”的问题,即在数字媒介时代本能与情感如何超越了事实和理性的问题。戴维斯认为,在技术和心理学之间寻找简单的因果关系很有诱惑力,但却从来都不是最有帮助的;与其问脸书或智能手机对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问社交和文化生活的模式是如何沿着数字线被重新绘制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消费主义的影响远不止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一般,社交媒体的影响无法通过观察纯粹“在线”发生的事情得到充分解释。<sup>④</sup>本书认同这种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出发,在媒介化社会发展进程中寻求后真相之于社会、政治与文化深远意义的看法。

科学界权威学术期刊《自然》(*Nature*)认为后真相是当下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词汇,对后真相的研究是考察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2016大选事件的必经之路。针对后真相现状、看法和应对等问题,该期刊向包括气候变化、可

---

① LEWANDOWSKY S. 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J].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2017(6):353-369.

② COOK J, ECKER H, LEWANDOWSKY 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misinformation and how to correct it[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2015:1-17.

③ MCLMTYRE L. Post-Trut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18:xiv.

④ DAVIES W. 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6.

持续性科学和生命科学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发问：“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中，客观事实和证据可能会湮没在直接诉诸情绪、情感和根深蒂固的个人信仰所产生的噪音中，科学家应该如何与之谈判？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公众接触并为科学发声？”<sup>①</sup>受访的几位学者无一不寄希望于建立规范秩序以寻找科学传播的合理答案。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共识：寻找共性话题，权衡中间立场，理解受众差异化，在地化直接接触，科学与信仰相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提升科学话语的叙述技巧，重视在社区讲座等公共空间发声，以及尝试进行“身份认同”等人际、组织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法。

英国政治期刊主编、学者马修·德安科纳(Matthew d'Ancona)将后真相描述为“情绪叙述的复苏”，认为它是真理作为社会储备货币的价值下降，以及被伪装成合法怀疑主义者的情绪与虚假信息的传染性蔓延。他将政治领域的后真相现象归咎于公众的漠不关心，以及与政客的相互勾结。并且，他认为互联网是后真相之所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和不可或缺的引擎，尤其社交媒体引发了过滤泡和回音室的负面效应，应当承担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分销商的责任，并采取行动。<sup>②</sup>《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主编阿卡迪·奥斯特洛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通过对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媒体发展情况的梳理，强调了后真相与“假新闻”之间的重要区别。他认为前者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促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政治和社会现象，加深对相关历史的理解，以及对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反思。<sup>③</sup>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詹姆斯·鲍尔(James Ball)概述了霸权操纵者如何通过媒体惯有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的假象来破坏和维持“废话”文化；他颇具创见性地指出情感并不以牺牲理性为代价，情绪普遍存在并与理性相互关联；而后真相

---

① GEWINV. Communication: Post-truth predicaments[J]. *Nature*, 2017 (541), 425-427.

② ANCONA M. Post-truth: the new war on truth and how to fight back[M]. London: Ebury Press, 2017: 2, 26, 49.

③ OSTROVSKY A.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the rise of Putin and the age of fake new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7: 78.

现象让很多研究领域重新意识到情绪是重要的。<sup>①</sup>实际上,情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领域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女权主义者、批判理论家以及一些“非主流”领域学术研究者对情感的争论与探讨已历经数十年。<sup>②</sup>毕竟,“如果情感是后真相的核心,那么女权主义学者有着很长的历史和情感可以参考”<sup>③</sup>。

由此可见,媒介环境与文化建构对后真相问题研究来讲极为重要。《经济学人》主编就曾指出,特朗普和普京的舆论领袖形象是大众媒体而非传统政治的产物,这无疑是在突出“政治如何被媒介化”这一过程,即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机构日益采用媒体逻辑的过程。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算法和有针对性的广告重新塑造了全球政治空间中的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在2016年之后,社交媒体成为该类研究的重点。加拿大传播学者杰森·汉纳(Jason Hannan)认为目前至少存在两种后真相问题的研究框架:一是关注媒体和新闻,二是关注媒体和传播技术;而社交媒体正是后真相世界的驱动力。<sup>④</sup>

康奈尔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教授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在关于“后真相、另类事实和非对称性争议”的三部曲文章:《在撒谎者与真理者之间》(*Between Liars and Truthers*)<sup>⑤</sup>、《不文明的认知论》(*Uncivil Episte-*

① BALL J. Post-truth: How Bullshit Conquered the World[M]. London: Bite- back Publishing, 2017:129.

② CRAWFORD C N.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0,24(4):116-156.

③ AHALL L. Affect as methodology: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2018(12):36-52.

④ HANNAN J. Trolling ourselves to death? social media and post-truth politic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32(2):214-226.

⑤ LYNCH M. Post-truth, alt-facts, and asymmetric controversies (Part I) Between liars and truthers. First 100 days [EB/OL]. Harvard STS Program, (2017-02-06) [2017-10-12]. <http://first100days.stsprogram.org/2017/02/06/post-truth-alt-facts-and-asymmetric-controversies-part-i/>.

mology)<sup>①</sup>和《真理者悖论》(*The Truther Paradox*)<sup>②</sup>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当我们深入研究‘后真相’这个问题时,真理和事实的问题非但没有变得无关紧要,反而在公共政治辩论中变得异常突出”。党派之间或当权与主流媒体之间的争论并不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而是诉诸所选择的“客观事实”,但这场舆论的争夺战是不对称的,双方均占有各执一词的“事实”。与此同时,他呼吁批评界暂时把注意力从特朗普身上移开,应当去关注“我们在面对‘另类真相’时面临的真正困难:站在所谓的真相和另类事实背后的是一群公众支持者,他们选择欣然滞留在自己的另类媒体和另类智库的话语世界中”<sup>③</sup>。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兰德智库(RAND)在2018年公布的研究成果《真理的衰变》(*Truth Decay*)<sup>④</sup>中提出,后真相现象与美国真理衰变历程有关,并以数据的方式分析了美国公共生活中事实和分析的弱化,证明了目前真理的衰变主要表现为四个趋势或标准:一是事实与对事实和分析的解释越发不一致;二是观点与事实的界限模糊;三是意见和个人经验对事实的相对影响越来越大;四是对过去受人尊重的事实信息来源的信任度下降。

---

① LYNCH M. Post-truth, alt-facts, and asymmetric controversies (Part II) Between liars and truthers. First 100 days [EB/OL]. Harvard STS Program, (2017-02-20) [2017-10-12]. <http://first100days.stsprogram.org/2017/02/20/post-truth-alt-facts-and-asymmetric-controversies-part-i/>.

② LYNCH M. Post-truth, alt-facts, and asymmetric controversies (Part III) The Truther Paradox. First 100 Days [EB/OL]. Harvard STS Program, (2017-04-26) [2017-10-12]. <http://first100days.stsprogram.org/2017/04/26/post-truth-alt-facts-and-asymmetric-controversies-part-iii/>.

③ LYNCH M. Post-truth, alt-facts, and asymmetric controversies (Part I) Between liars and truthers. First 100 days [EB/OL]. Harvard STS Program, (2017-02-06) [2017-10-12]. <http://first100days.stsprogram.org/2017/02/06/post-truth-alt-facts-and-asymmetric-controversies-part-i/>.

④ KAVANAGH J, RICH D M. Truth decay: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facts and analysis in American public Life[R]. SANTA MONICA: RAND, 2018.

实际上,这也是数字媒介环境的变迁所导致的个体媒介效果的差异化表现。

关于产生后真相的一系列复杂的背景原因,波士顿大学研究员李·麦金太尔(Lee McIntyre)通过分析美国就业人群、犯罪统计数据 and 民众投票行为等,总结了后真相现象产生的原因,其中包括:民众对科学事实的怀疑,比如有关吸烟、进化、疫苗和气候变化等事实;心理学的认知偏差导致了选择性理解;媒介生态图景的转变: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弊病;作为政治工具的假新闻的出现;右翼分子假借后现代主义之名,发起对科学真理和客观事实的攻击,等等。<sup>①</sup>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文献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桎梏,社会资本的普遍下滑——善意、同情与信任度的降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主流价值观的转变,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两党关系极化和民众在政治不平衡的环境下的轻信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

美国社会哲学家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提出将后真相现象归咎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 STS)对“对称性”<sup>②</sup>观念的扩大和普及上,认为其应对后真相现象负责。<sup>③</sup>实际上,这是对 STS 研究中缺乏规范关怀的一种指责。《科学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期刊对此给予了批评和回应,其反击的论点在于认识的民主化需要相当充足的政治经济知识,而 STS 的批判性研究恰恰对社会知识的累积贡献良多:它对知识建构的详细描述和努力,以及在基础设施、独

① MCLINTYRE L. Post-Trut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8.

② 在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称性”由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在其著作《知识与社会意向》中提出,指的是“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转引自刘华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属于质疑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强纲领”:因果性、对称性、公正性和反身性四个重要原则之一。

③ FULLER S. Embrace the inner fox: Post-truth as the STS symmetry principle universalized [EB/OL]. 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 (2016-11-25) [2017-10-15]. <https://social-epistemology.com/2016/12/25/embrace-the-inner-fox-post-truth-as-the-sts-symmetry-principle-universalized-steve-fuller/>.

创性和有效结构等方面的合理把控。而且,“另类事实”只是一种目标不对称的漫谈策略,基于意识形态、既得利益或可疑信仰的公众情绪与所谓的“对称性”没有必然关联。

作为哲学和科学历史类别排名首位的 SSCI 期刊,《科学社会研究》在 2017 年的首篇社论中以《后真相?》为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学术疑问:我们是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随着美国 2016 年大选不断传来的假新闻、容易被揭穿但却广为流传的阴谋论,以及立于中心位置的公开谎言……我们是否已进入了一个时代的转角?该社论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它认为作为“媒体人总统”的特朗普一反以往政客惯用的政治道歉路径,采用了“另类事实”的情绪化路线调动选民的舆论支持;它还强调了社交媒体平台过于“工具性”和“中立性”,无法制止其平台上出现的政治丑陋行径和非民主暴力活动的滥用,这是导致后真相混乱的重要原因。这一系列乱象归结于在认知竞争中“只把选民当作被操纵的人,而不是被说服的对象”<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认知竞争是指关于选择哪些真理可以被认为是显著和重要的,就像选择哪些主张可以被认为是正确和错误一样,这些选择具有重要的后果”<sup>②</sup>。

早在 2004 年,美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精神进行了反思,对此他表示了一种担忧,即所谓的批判精神将被阴谋论利用,从而“使我们堕入错误的道路,引导我们打击错误的敌人,并被错误的盟友认为是朋友”。他同时指出“问题不在于脱离事实,而在于离事实更近一些,不是反对经验主义,而是复兴经验主义”,<sup>③</sup>从而将批判经验主义与政治阴谋论划清界限。这一点提示我们,一方面,对后真相问题

---

① Editorial. Post-truth?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47(1):3-6.

② SISMONDO S. Pushing knowledge in the drug industry: ghost-managed science[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5:31-48.

③ LATOUR B.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J]. Critical inquiry,2004(30):225-248.